

# 温故

之二



温故 书坊

沈容 热闹的月坛北街  
余英时 胡适日记中的「二二·九」运动  
王学泰 南口杂咏  
孙卓 民国旧事：湘人治湘（下）  
冯群力 中苏论战缘何开

傅国涌 1967年：梁漱溟在动，静之间  
颜文斗 鱼殇：三峡的卵流、小鱼和大鱼  
杜欣欣 墓石之魂  
邓云乡 传统诗词与吾家及我  
傅月庵 「不复听卖菱角声，不吃西瓜矣」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故(之二)/刘瑞琳主编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 9

ISBN 7 - 5633 - 4916 - 2

I . 温… II . 刘… III . 中国 - 现代史 - 研究 - 文集 IV . K26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653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  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责任编辑:曹凌志

装帧设计:陆 泉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 - 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:271000)

· 开本:635mm × 965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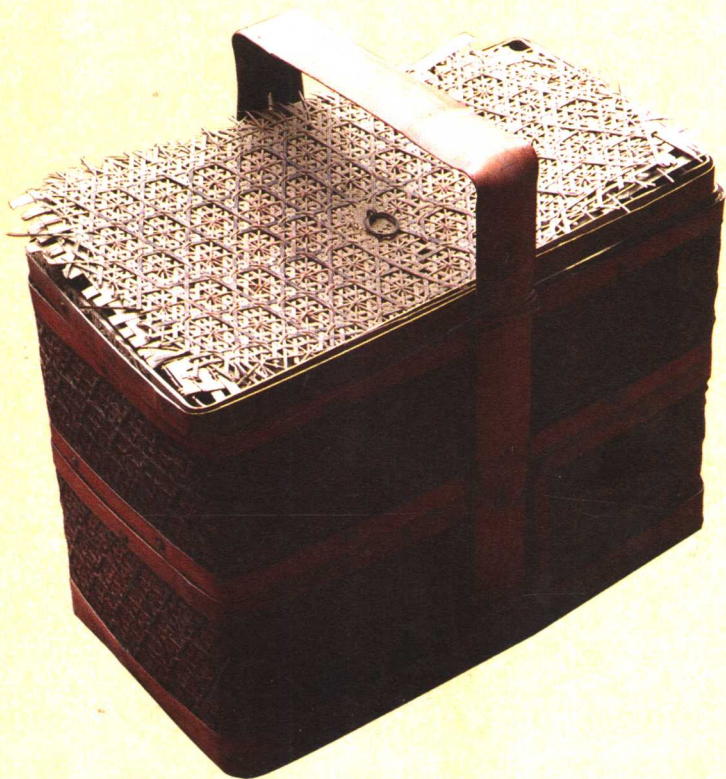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:12 字数:170 千字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 001 ~ 10 000 定价: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

### 有提把儿的食盒

竹质，上下两层。长四十一厘米，宽二十四厘米，高三十九厘米（包括把儿）。晋南一带民间，历代相沿之岁时习俗，如腊八、祭灶、春节、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秋等，各家各户纷备供品，以祭神明祖先，食盒亦祭祀必备之器物。

此百年之物，虽已破旧，然其工艺考究，编织精巧，令人临睹，犹为之慨叹。

（沈继光 高萍供稿）





1953年，国民党“缅北孤军”在营地进餐。（参阅“现场”《“孤军”岁月》）

## 编辑絮语

二十多年以前，关于读书应不应有“禁区”，曾有过疑惑，也有过一些讨论。李洪林先生后来刊登在《读书》上的那篇著名的“解惑”之文《读书无禁区》，算是为那些讨论作了一个总结。文章发表后，虽也招致某些方面的批评与指摘，但“读书不应有禁区”却从此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，中国人的阅读乃至整个的精神生活，都因之发生了重大改观。

重提这段旧事，盖因“温故”与“读书”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。譬如，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学习。既然只有无禁忌的阅读，才便于我们在比较、鉴别中汲取丰富多元的知识与养分，那么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也只有摒弃成见、放开视野，才有可能从繁复多变、声情并茂的历史活剧中，从人类以往的经验与教训里有所收获。

孔子说过“温故而知新”这样富有智慧的话，但同时，他老人家“成《春秋》，令乱臣贼子惧”，又是将“温故”服务于政治的始作俑者，开了根据现实政治需要编写历史的先河。就说一个“讳”字吧，几乎成了历代史官们的金科玉律，他们自觉地为“尊者”讳，为“贤者”讳，更要为“当朝者”讳，讳来讳去，把一部历史“讳”得支离破碎，面目全非，几成“断烂朝报”……

可见，真要做到“温故而知新”，就不能不从“讳”字当头的阴影里走出来，破除“温故”的种种禁忌，以开放的、从容的态度面对过去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了美国的小阿瑟·施莱辛格在《美国的分裂》里说过的一句话：“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提高哪个群体的自尊，而是为了解世界和明鉴过去……”

此种境界，亦《温故》心向往之矣。

主 编 刘瑞琳 执行主编 温故书坊 特邀策划 丁 东 张冠生

## 温故 目录

### 时 论

沈 容 热闹的月坛北街 / 1

### 文 林

余英时 胡适日记中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 / 16

王学泰 南口杂咏 / 25

谢 泳 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 / 35

### 回 眸

孙 卓 民国旧事：湘人治湘（下） / 38

冯群力 中苏论战缘何开 / 61

### 人 物

傅国涌 1949年：梁漱溟在动、静之间 / 76

尔 建 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 / 89

- 刘方炜 理性和良知让人如此美丽 / 100  
冰洲石 《独立评论》中的陶希圣 / 106  
五味子 鲁迅后人的“名人之累” / 113

### 风物

- 颜文斗 鱼殇：三峡的卵流、小鱼和大鱼 / 120  
杜欣欣 墓石之魂 / 130  
王碧岑 记忆中的安阳袁世凯故居 / 135  
散 木 闲话广场春秋 / 142

### 现场

- 徐宗懋 “孤军”岁月 / 149

### 记忆

- 邓云乡 传统诗词与吾家及我 / 157  
附：“文革”中关于旧诗词的检查  
杨淑贤 老铁二区的那家商店 / 170

### 史海浮言

- 傅月庵 “不复听卖菱角声，不吃西瓜矣” / 173  
陈壁生 不该忘却的遇罗克 / 176  
张 鸣 同文馆的“成就” / 182

### 双清沙龙

- 温故的意义 / 184

# 热闹的月坛北街

沈 容

## 可怜天下父母心

1973年，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。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。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，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：调夫妇一方，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，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。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，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。

北京分社没有宿舍，有一阵，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，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。当然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几经周折，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。

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。按现在的标准，可说是简易房，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。我们住在四层楼。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，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。我们有两套房，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，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。有这三间房，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。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、惊心动魄的三年。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！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，各色人等都有，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。打从到北京以后，最难忘、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。

我还是从头慢慢说起。有了房子，就可以和亲朋好友走动走动，叙



叙旧，吃顿饭。那时还不兴上馆子，都在自己家里做几个菜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朋友们见面，离不开的话题是如何把子女调回来。我们的朋友大都是戴过各种“帽子”、关过“牛棚”而后“解放”的，子女们都上山下乡去了。怎么把子女调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。一代年轻人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，作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。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在广东。我们也四处奔走、八方打听调子女的办法。可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后来，听说中央有一个政策：老同志可以调一个子女来京。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，朋友们欣喜欲狂，奔走相告。可是谁也说不出怎么个调法。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，首先考虑的是先调大女儿，还是先调小女儿。书信往返，商量再三，决定先调小的。因为大女儿在广州，还有朋友照应，小女儿远在韶关一个工厂里。接着发愁的是怎么个调法。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，先是开大吊车，后来说女孩子开大吊车太危险，就让她学会计。好不容易经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轻局要会计，我们就和一轻局联系。一轻局人事部门的人说：“只要韶关方面肯放人，我们就下调令。”于是，我们马上和韶关联系，韶关工厂方面则说：“只要对方下调令，我们就放人。”来来回回联系多次，都是这两句，谁也不说第一句话。真不知道奥妙在哪里。事也凑巧，李普有一个学生在月坛区政府工作，她说可以把户口先调来，再谈工作。经她帮忙，调来了小女儿的户口，这样小女儿就进了一轻局。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，户口之所以那么重要，是因为那时吃饭要粮票，穿衣要布票，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。没有户口就没有那些票。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落户口更是难如上青天。所以，哪个单位都不愿找这个麻烦。

我女儿调来北京，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。新华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来我们家，打听我们的女儿是怎么调回来的。我告诉她先调户口。但是，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学生了。因为她说过，她是破例帮了这个忙。田林知道了这个窍门，然而却不知道大门在哪里，还是急得团团转。我认识一个小朋友，在中央电视台当摄影记者。有一天他来我家玩。我把田林要调女儿来京的事告诉了他，因为田林的丈夫和这位记

者在同一个单位，彼此都认识。这位朋友想了一下，说：他有认识的人，可以帮忙，但是千万不能让田林夫妇来找他。因为，台里一旦知道，他的饭碗就难保。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田林，并且一再叮嘱她，千万不要去找那位记者，又把她女儿的姓名、地址告诉了记者。一切顺利，不久孩子也调回来了。谁知田林的丈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，太高兴了，竟跑到记者的办公室去感谢他。越感谢那位记者越着急，跑到我家来抱怨说怎么搞的，千叮嘱万叮嘱，他还是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一高兴竟什么都忘了。这位记者后来到了美国，现在也不在乎泄漏这个秘密了。

### “泡病号”的日子

我没有进新华社，调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台。那时还是“四人帮”的天下，工作了一阵，实在干不下去，就称病在家“泡病号”。像我那样“泡病号”的人当时还不在少数。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坛公园去锻炼身体。

有一天，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了原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。他住在统战部他夫人的宿舍里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经过月坛北街。当他知道我们在月坛公园锻炼身体，就自告奋勇每天来教我们打太极拳。有一阵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坛公园跟司徒慧敏学太极拳，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进早餐，海阔天空地聊一阵。司徒的到来，使我们“泡病号”的日子中，多少增加了一点色彩。司徒在上个世纪30年代江青当电影演员时，曾当过江青的导演。上海电影界的人，凡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，都在劫难逃，廖沫沙和江青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，沫沙在“文革”一开始就提心吊胆，很快他就在全国大张旗鼓讨伐“三家村”的事件中给逮住了，他是“三家村”的一家。司徒和江青接触更多，而他竟能幸免，我不知道他有个什么窍门。他为人和善，健谈，见多识广，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懂一点俄文、法文，人们戏称他懂“八国英文”。在共进早餐

时，他常常说一些笑话，引得我们哈哈大笑。有一次，他讲他曾陪茅盾去苏联，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园。到了公园，游客听说茅盾是中国的一位大作家，围住了他。茅盾即席发表演说。司徒只好给他当翻译。司徒说：“我懂得的俄文有限，一般日常用语可以对付，而茅盾大讲特讲文学，我没办法，只好茅盾说茅盾的，我说我的，翻来覆去讲中苏友谊，因为我只会说这两句话。”虽然我们一天不落地去公园跟司徒学拳，不记得学了多久，但是始终没有学会。

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汉口《长江日报》用“马铁丁”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，这些杂文名噪一时，后来结集出版，洛阳纸贵。这三位朋友是诗人郭小川、后来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和《人民日报》副刊主编陈笑雨。我们到北京时，郭小川听从友人的劝告到河南躲了起来。陈笑雨在“文革”开始不久自杀了。他是副刊主编，理所当然属于文艺黑线人物。批斗文艺黑线人物，他被拉去陪斗了一场，他就自杀了。听说他陪斗以后回到家里又挨家人批斗。红卫兵批斗，那是“造反有理，革命有功”，当然不问是非，不分青红皂白；如果自己的亲人和红卫兵一样，那真是无路可走了。无独有偶，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发郭小川，所以，有人叫郭小川赶快躲起来。有一天下午，郭小川的小女儿梅梅来我们家，她说，她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，回家说了说，她妈妈马上记下来。梅梅吓坏了，不敢再回家，在我们家吃了晚饭，马上乘火车到河南她爸爸那里去了。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，妻子出卖丈夫，妈妈出卖女儿，难道人们真是疯了？郭小川死得很奇特，刚粉碎“四人帮”，他十分兴奋，那时他还在河南。晚上，他吃了安眠药，躺在床上抽烟，烟头点着了床褥，他竟没有发觉，就这样走了。

“马铁丁”中仅剩的一位张铁夫，住在月坛南街，离我家很近，我们经常往来。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，有时还住在他家。张铁夫刀功极好，他可以把黄瓜、胡萝卜等蔬菜切得很细，拌成凉菜，真是一绝。后来，我们搬了几次家，铁夫也搬到万寿路，相距远了，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。去年，我们特地买了一盆杜鹃花去看望他。他正在吸氧气，哮喘很厉害。

谈到“马铁丁”那本杂文时，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‘马铁丁’分家了。”这真具有讽刺意味，他说：最早是陈笑雨的妻子把“马铁丁”杂文集中陈笑雨的文章抽走了，要另外出书；接着，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抽走了。他说：“剩下的就是我的了。”

## 对门的“叶师傅”

我们住的四层楼，还有一套房子，是三间一套，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。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，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。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，互相常来常往。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。叶子龙那时还没有“解放”。他身强力壮，精力旺盛，很会生活，又健谈。在生活方面，他是我们的顾问。那会儿时兴称呼“师傅”。我们都叫他“叶师傅”。因为，像我们这一号人，称什么“长”不合适，称“同志”既生分，而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，称“师傅”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。现在想来，称“师傅”充满了“时代感”，妙极了。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，是陕北人的叫法。小外孙才四五岁，有时候他们出门，就把他放在我们家。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。他教给我做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，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，用小茴香、盐、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，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，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，再和上那些末末，放在瓶里。大概一星期以后，打开瓶盖，香气扑鼻，味道鲜美。叶师傅还会腌雪里红，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红，又是一道美味佳肴。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，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。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。

我曾想，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，一定饱读诗书，满肚子逸闻秘事。可是，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和我谈这些，所以不好贸然问他。有一天，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。我说，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。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，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。检讨什么呢？他说，很简单，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。我



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。叶师傅告诉我，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。那时，中央开会，或毛泽东找人谈话，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，有时听不清、记不下，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，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，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。过了一阵，被毛发现了，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。这事涉及的人很多，我问叶师傅，该怎么检讨。他说，不牵扯别人，只说自己不对就行了。我按他的要求，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，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。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来。话匣子一打开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虽然被撤了职，但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，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。他说，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，毛生活上一切事务他都管。毛泽东要做衣服，不用到裁缝店里去，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。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高、肩宽、袖长、腰围等等尺码，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，选好衣料，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，做出来的衣服，保管合身。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。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，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。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，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，介绍给我们。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，他说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。他称她小陈。这位小陈长得非常漂亮，能歌善舞，又很聪明。要她跳什么舞，就能跳什么舞。有一次，她看毛闷闷不乐，就要毛猜一个谜语。这谜语是“毛泽东打喷嚏”。老人家猜不出来。她说：“很简单么，‘毛病’。”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。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，要求给她一份职务。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，为此，她离毛而去……这些故事对我来说，真是闻所未闻，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南海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。很久以后，听说这位小姐去了香港。

## 楼上的新邻居

我们住的五号楼的五层楼上那时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。有一天，有

人来看五楼的房子。叶师傅最清楚，他说，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，可能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。然而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，而是一对老年夫妇。老太太够胖的，戴了一副金耳环。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，因为“破四旧”时，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。老大爷比较瘦，但很结实。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，开头完全尽义务，老大爷闲不住；后来拿“补差”。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，但是有点怪。更使我们纳闷的是：究竟是什么人，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。

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，他告诉我们：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。叶师傅说，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，呆在家里不舒服，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。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，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。新的邻居搬来以后，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。最忙的是叶师傅。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，如水表、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；然后来告诉我们，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，什么颜色，放在什么地方等等。有一次，他从五楼下来，对我们说：“毛主席现在湖南。”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，他说，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，包羊腿的报纸是《湖南日报》。他很善于和人交往，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。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。

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，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，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。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。影片《创业》给“四人帮”枪毙了，贺捷生动员编剧给邓小平写信，要求邓小平重审。这事显然是针对“四人帮”的，非同小可。信如何写法，自然要反复推敲，各方征求意见。贺捷生告诉我，她曾对编剧说，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。她问编剧敢不敢冒这个危险，编剧甘愿冒险呈书。编剧的妻子也支持写信。贺捷生告诉我，她曾对编剧说，万一编剧要坐牢，她一定去牢房送饭。经过这一番努力，《创业》终于上演了。

## “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！”

有一阵，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。她很有礼貌，来我家时，总忘不了说一句：对不起，借打一个电话；打完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。有一次，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，叫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，很“热络”。作为邻居，来打个电话，是人之常情，何况她还彬彬有礼。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：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，一是要车来接她。不久，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。她来我家，与张玉凤完全不同，仰首阔步进来，打完电话就走，那真叫傲气。碍于情面，我们也就让她打了，大家都是邻居么。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，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。她的电话一多，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，李普不耐烦了。有一次，又是她的电话，李普抓起电话，厉声说：“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！”啪地把电话挂断了。

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，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，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来。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“红旗学生”。所谓“红旗学生”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。那时，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，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，当然全校轰动。晓平说，这位“红旗学生”不和大家一起上课。她要把老师叫去，单独给她讲课。学校叫她填表，她说：“填什么表，你们叫汪东兴去填。”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。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。他告诉我们：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，后来，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，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。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，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。终于使毛大发脾气，拍桌子叫她滚蛋。真叫她滚蛋了，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。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把她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学习。这样，她也住到月坛北街这里来了。

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，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。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。那天，我在楼梯口，看到一位身穿军装、老迈龙钟的军人

吃力地爬上高楼，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。我看着，心里很不是味儿。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，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，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，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？

## 不平凡的一年

转眼到了1976年，这是不平凡的一年，天翻地覆的一年，有悲，有喜，有惊，有乐，有哭，有笑。先是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去世，其间还有唐山大地震，更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“四人帮”的覆灭。我们的月坛北街五号楼也是热闹非凡。这要从头说起。

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去世。9日清晨，收音机里传出了哀乐，宣读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。我当时还没起床，眼泪止不住流下。接着，听到四邻的哭声。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生病，但是不知详细病情。就在前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，周恩来还出席讲话。老伴李普参加了那次大会，他告诉我：当周恩来到达会场时，与会者长时间地鼓掌，坐在后面的人，竟站在椅子上，要看一眼周恩来。大家都想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了，但是都没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！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、横行霸道使人们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，周恩来的去世，人们的悲痛可想而知。“四人帮”竭力阻止对周恩来的追悼。他们对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时间、人数有严格的限制，不准人们戴黑纱，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等。然而，在周恩来灵柩送往八宝山时，首都民众自发地扶老携幼在刺骨的寒风中挥泪相送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。

在遗体告别时，各单位的名额有严格的限制。我可以去，但我的女儿抗美哭着，死乞白赖也要去。当时有一条规定，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，可以优先。我利用这一条，把抗美带去了。我说，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时，他曾问到过我女儿，所以我要带她去。这是真的。1964年秋，我带着中南五省的小戏到北京演出，请总理看戏。休息时，在休息室里，陈锡联拉着我到总理跟前，向总理介绍说：“总理，我给你介



绍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。”总理见我，笑了，说：“不用你介绍，我早认识她了。”我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过，周恩来直接领导外事组的工作。接着他问到李普以及我女儿的情况。抗美就这样跟着我挤进了遗体告别的行列。

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。这和他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极不相称，来向遗体告别的人川流不息，拥挤不堪。

种种限制，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。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。这时，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，他说，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灵堂悼念周恩来；要求延长遗体告别的时间，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。张玉凤说，让她请示一下。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。不一会，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，她说：请示过了，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。

1月15日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，邓小平致悼词。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最后一次露面。接着，报上或明或暗地、由暗到明地点名批判小平了。这更激发了人们对“四人帮”的愤恨。这一愤恨终于爆发了。从3月下旬到4月5日，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，其实是声讨“四人帮”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抬着各式各样的花圈、花篮来到天安门。有的花圈硕大无比，要用大卡车运送。花圈上以及广场两边的柏树上挂着无数诗词，拥挤的人群忙碌地抄写诗词。我们附近的年轻人都到天安门去抄写，然后来我们家互相交换，我也忙碌地抄写诗词。4月5日深夜，“四人帮”调动一万民兵、三千公安人员、五营人民解放军殴打和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，捣毁了所有的花圈。4月7日，中央通过了《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》，人们又陷入无奈的悲痛和愤怒中。

悲哀一个接一个，7月6日，朱德去世。

不到一个月，7月28日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。我们都还在睡梦中，李普首先发现房子、家具晃动。他说，地震了，我们慌忙起床。天下着蒙蒙细雨，我们打着伞赶紧往月坛公园跑。这时，公园里已挤满了人。